

宋代以来客家移民开发岭南西部边疆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

郑维宽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宋代以来客家人向岭南西部边疆的不断迁移,充分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岭南西部的经略方向和经济开发进程。随着客家移民的触角从早期的桂东南逐渐延伸到北部湾沿岸、桂西南沿边和桂西边缘地区,在人口增长和生产技术的推动下,岭南西部的经济开发经历了一个从东至西、从腹地到沿边地带推进的过程。在此客家移民、经济开发与王朝的边疆经略相契合,而客家移民无疑是主体,在王朝经略岭南西部、开发和巩固岭南边疆、实现岭南西部边疆地区“内地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岭南西部 边疆 客家人 宋代 明代 清代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434X(2013)05-0035-06

客家人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客家民系究竟于何时形成,岭南客家人与来自中原地区的其他汉族移民之间有何区别,迄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秦汉以来由中原地区迁入岭南地区的汉族官员、戍边将士和移民都是客家人,并且认为客家民系并不是汉族人口南迁以后才形成的,他们在中原地区就存在了。^①笔者认为,把凡是中原地区南迁的汉族人口都认定为客家人,将面临解释上的困境:一是将中原地区的汉族等同于客家先民,那么客家人就不只是汉族的一个支系,而是汉族的另一种称谓,但这种说法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二是既然迁至南方的汉族移民都是客家人,那么就不会存在操不同方言的汉族群体,但事实上中国南方存在操湘语、赣语、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等不同方言的汉族族群,足以印证中原汉族移民迁入不同地区后,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与不同的土著居民交往、融合,就会形成不同的方言和汉族族群。林开钦先生为此提出了判断汉族客家民系形成的

四个特征:一是有脉络清楚的客家先民,二是有特定的地域条件,三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四是有独特的客家文化。^②林先生认为,南迁汉人形成客家民系的时间是在唐末以后,其中宋代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关键时期,而闽粤赣边区则是客家祖地。笔者赞同林先生的观点,认为客家人移居岭南西部边疆地区进行开发的时段应该定在宋代以来,不能无限前推,而且岭南西部的客家人主要是从客家祖地的闽粤赣边区迁移而来。

本文所称的“岭南西部边疆”,主要包括桂西边缘地区、桂西南沿边地区和北部湾沿岸地带,这些地区相对于广西腹地而言,是中原王朝统治者眼中典型的边疆地区。当前有关广西客家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多关注客家自身的文化、经济生活、迁徙与族群关系等,对客家人如何一步步深入岭南边疆民族地区,促进边疆的开发与巩固关注较少,而这一点却最能体现客家人不畏艰险、坚韧耐劳的精神及其在边疆开拓中的贡献。笔者试通过厘清宋代以来客家人向岭南西部边疆移居的历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AZS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0YJA770073)

① 钟文典. 广西客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3.

② 林开钦. 论汉族客家民系[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 2.

过程,探讨随着中原王朝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经略,代表中原文化、掌握先进技术的客家人如何通过自身努力,在岭南边疆地区定居立业,成为开发、巩固边疆的重要力量,促进了边疆地区的民族交往和“内地化”进程。

一、宋代客家人向桂东南和钦廉地区的避乱移居与农业开发

宋代客家人迁入岭南西部,主要经由两大路线:一是从闽粤赣边区前往岭南西部的东西向迁移,反映出岭南地区客家人逐渐西移、开发边疆的一种趋势;二是从江西、湖南越过南岭山地迁入岭南西部的南北向迁移。客家人迁入岭南西部后,较早分布于桂东南地区,到了南宋时期,进一步迁徙到北部湾沿岸地区,成为宋王朝在岭南极边之地的重要开发力量。

桂东南成为宋代客家移民迁入的主要地区,与该地区交通较为便利、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开发水平较高、中央王朝的统治较为稳固有关。其中南流江既是沟通桂东南与北部湾沿岸地区的重要通道,流域内又是农耕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无疑是客家人的理想移居之地。今天南流江流域作为广西客家人的聚居之地,是宋代以来客家先民不断移居该区域的结果。据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4记载“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南宋初,为躲避战乱,迁入岭南西部的北方移民很多,这些移民不仅包括来自中原地区的士大夫,而且包括大量的普通客家人,他们是较早迁入桂东南的客家移民。今天在桂东南的许多客家人族谱中,往往会找到其祖先居官留止或仰慕当地风水定居的记载,这其实是对客家先民移居桂东南那段历史的记忆和雅化而已,并不表明其祖先真正做官而来或该地风水绝佳云云。同时史料也表明,南宋初期确实有大量中原官员避难寄居广西,但他们并不是接受朝廷任命到广西任职,仅是避难而已,甚至还需要官府的救济。绍兴初,鉴于到岭南西部避难的中原官员人数众多,生计艰难,于是朝廷多次下令广西地方官拨给廩禄救济。^①此外,随着客家移民的增多,促进了桂东南人口的急剧增长、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

据嘉靖《广西通志》卷17《风俗》引《容县志》载:“宋南渡后,北客避地者多,衣冠礼度并同中州。”南宋时期桂东南户口增长迅速,整个广西都是户口增长最快的地方,绍兴三十二年(1162),广西的户数比元丰年间(1078~1085)增长了24.6万户。^②很显然,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不可能是人口自然增殖的结果,而是北方移民大量迁入后引起的机械增长。

南宋初桂东南人口的快速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土地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变迁,甚至频繁出现老虎因栖息地日益缩小而四出伤人的事件。据宋人蔡绦说“岭右顷俗淳物贱。吾以靖康岁丙午(1126)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过墟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瞰篱,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从篱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视虎,犹犬然尔。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虎害伤人。今则与内地勿殊,陷人略不遗毛发,风俗浇厚,乃亦及禽兽耶?”^③由此可见,客家移民的快速增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桂东南地区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

不仅如此,客家人还经由桂东南,顺南流江而下,向北部湾沿岸地区移居,既包括来自岭北的客家人,也包括来自福建的客家人。根据宋人周去非的记载,南宋前期广西钦州已经有客家人聚居。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五民》中说,钦州人分五种,包括土人(即骆越后裔,多居于村落)、北人(即来自岭北的客家人)、俚人(亦骆越后裔,多居于山峒)、射耕人(即来自福建的客家人)、蜒人(水上居民)。其中“北人”主要是因唐末五代之乱从中原南迁至钦州的客家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保留中原正音的基础上,也夹杂了一些岭南土著居民的语音,因此周去非说:“(钦州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④笔者之所以将“北人”认定为客家人,主要是根据他们所操语言作出的判断。根据周去非的记载,南宋前期居住在钦州城郭地区的岭北汉族移民,其语言平易,远

① (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M]. 绍兴三年三月癸卯. 四库全书本.

② 元丰户数来自《宋史·地理志》,绍兴户数来自《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

③ (宋)蔡绦. 铁围山丛谈卷6[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④ (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五民[M]. 四库全书本.

比闽语、湘语为雅,甚至比中原地区还古朴雅正,比如“早曰朝时,晚曰晡时,以竹器盛饭如篋曰箪,以瓦瓶盛水曰罍,相交曰契交,自称曰寒贱,长于我称之为老兄,少于我称之为老弟,丈人行呼其少曰老侄,呼至少者曰孙,泛呼孩提曰细子,谓庸惰为不事产业,谓人仇记曰彼期待我,力作而手倦曰指穷,贫困无力曰力匱,令人先行曰行前,水落日水尾杀,泊舟曰埋船头,离岸曰反船头,舟行曰船在水皮上,大脚胫犬曰大虫脚。若此之类,亦云雅矣”。^① 这些词语既属于汉语中原正音,同时又融合了岭南土著语言的一些要素,与今日的客家方言词汇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射耕人”则是来自福建的客家人,因占地而耕,因此被称为“射耕人”。“射耕人”虽然操闽音,但这种福建话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闽方言,而是中原地区的客家移民南迁至福建境内后融合当地方言形成的。

在宋代客家移民到来之前,钦廉地区的农业因为气候温暖,复种指数高,即使粗放经营,亦能维持生计。^② 而作为客家人的射耕人,是掌握了较为发达农耕技术的农业移民,他们的到来使钦廉地区的农业面貌有所改进,而农业的发展又为容纳更多的客家移民奠定了基础。从钦廉地区一些客家人的族谱看,南宋前期和宋末元初是客家移民迁入钦廉地区的两个重要阶段。据黄嘉猷《江夏黄姓族谱》(1993年)记载,南宋淳熙年间,黄言带着儿子从广东嘉应州迁居合浦,其后裔分居钦州、灵山各地。黄言一家是从客家祖地迁徙而来,并发展成一个较大的家族。宋末元初,为躲避战乱,闽粤赣边区的客家人又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外迁。据李峤《吕迁善公族谱》(1750年)记载,南宋末年,福建上杭人吕康年、吕延年兄弟经由广东潮州迁居钦州,成为钦州地区吕氏的始迁祖。另据防城《钟氏宗支簿》记载,防城钟氏原居广东嘉应州兴宁县,宋末元初,钟文亮、钟文明、钟文聪三兄弟迁居钦州防城地方,分居三地。不难发现,两宋之际和宋末元初,位于岭南西部边海之地的钦廉地区成为客家人避乱谋生的重要移居地。随着客家移民的日益增多和后裔的繁衍,南宋前期还是钦廉乡村地区主要居民的“土人”逐

渐被客家人同化,而宋代钦州的“五民”(土人、北人、射耕人、俚人、蜒人)也逐渐演变为明代的“四民”(客户、东人、俚人、蛋户),反映出客家人在钦廉地区日益增长,并成为开发钦廉地区的力量。

二、明代王朝经略背景下客家移民对桂西南和沿海地区的开发

继两宋之际和宋末元初之后,明代是客家人移居广西的第三个阶段,在自东向西的迁徙过程中,桂东地区成为来自闽粤赣边区客家移民定居的首选之地。明代中后期,浔州府境内已经迁入了不少客家移民,故道光《桂平县志》卷8《经政·户口》载“至于明代,江西、福建、广东各省氏族来者弥繁。”平乐府昭平县在明万历六年(1578)镇压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后,鉴于地广人稀,官府招佃耕种,于是一批来自广东翁源县的客家人迁入昭平。^③ 如果大量收集并查阅今天桂东南地区客家人的族谱,不难发现其先祖于明代迁居该地的诸多记载。不仅如此,明代客家人还进一步迁移到桂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沿边地区,而且对北部湾沿岸钦廉地区的开发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一趋势与明朝统治者加强对桂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和中越毗邻地区的经略密切相关。

明代客家人大量迁入桂西南左、右江地区,为明王朝加强对岭南西部边疆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明朝统治者推行的改土归流主要发生在桂西南地区,无疑与王朝在岭南西部的经略重点和客家移民迁移的方向高度契合。据明人霍与瑕《霍勉斋集》卷20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左、右江地区大约有一半的人是来自广东的流民。作为沿边重镇的龙州,来自闽、粤、赣等省的客家移民也不少,据民国《龙津县志》第四编《社会·民族》和民国《广西通志稿》之《社会编·氏族二》记载,明代龙州有来自广东、福建、江西等省的客家移民,其中来自广东程乡的有王、江、吴、钟、陈、梁、甘等姓氏,来自福建、江西的有莫、班、吴、玉、彭、卢、陶、郭、王、邓、马、陈、林、夏等姓氏。

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左江流域的一些土官将祖先的来历攀附到宋代随狄青征侬智高这一历史事件上,杜撰其祖先来自山东,随狄青南征依

①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风土门·方言[M],四库全书本。

②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8花木门·月采[M],四库全书本。

③ 李树楠修,吴寿崧等纂,昭平县志卷7户口[Z],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智高,因功授职,世守桂西南各地,这种说法本不可信,但却迷惑了一些学者,钟文典先生由此认为这些土官的祖先是来自中原地区的客家人,显然难以成立。^①当然这种说法也有一个证据,比如说今崇左县境内有黄姓万余户,多数操客家方言,自称为宋代江州土官黄胜奇的后裔。但是一定地区人群的语言在受到外来族群强力同化的情况下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情况可以用来解释崇左土著黄姓操客家方言的原因。因为随着明代中央王朝对桂西南统治的强化,大量汉族移民迁入桂西南地区,促进了本地土官“汉化”特别是“客家化”的进程,因此黄胜奇的后裔在民国年间多操客家方言,应是受到客家移民同化的结果。^②

明代随着客家人进一步向北部湾沿岸钦廉地区的移居,不仅促进了该地区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开发,而且有利于巩固明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客家农业移民在钦廉地区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比如来自福建的客家移民杂处乡村,“业耕种”,而且种植甘蔗等经济作物。据崇祯《廉州府志》卷4《食货志·物产》记载,嘉靖年间廉州府境内广泛种植甘蔗,其中“尤以镇西、北塞、张黄为盛”。另一方面,一些客家移民居住在城郭地区,从事商业活动。明人王士性记载廉州府境内的居民包括四种,即客户(指居住在城郭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汉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客家人)、东人(指居住在乡村地区从事农业耕种的客家人)、俚人、蛋户。^③事实上,从元末明初至明后期,客家人移居钦廉地区的步伐从未停止过。据北海《石氏族谱》载,石献义于明洪武年间从粤北迁居廉州府合浦县境内,经过600多年的繁衍发展,如今在北海、钦州、防城境内的石姓族人已达13000余人;合浦《张氏族谱》记载,明朝成化年间,张氏迁居廉州府合浦县六罗地方;北海《陈氏族谱》记载,明朝中叶,陈何九率家人从粤东迁至廉州,短暂居住几年后,又从廉州西迁钦州;合浦《彭氏族谱》记载,明正德年间,彭氏由福建迁居广东廉州、钦州、合浦,今天合浦县公馆镇陂滕村95%的人口姓彭,人数达万人。综观之,从宋

至明,今天北部湾沿岸地区都是客家人移居的一个重要区域,客家人在促进该区域的开发和巩固岭南边疆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清代客家移民对桂西边缘地区和中越边境地带的开发与边疆的“内地化”

根据有关研究,清初外省移民广西的过程,与客家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可以说客家人是清代广西移民最主要的来源。^④明末清初,随着南明政权以广西作为抵抗清军的后方基地,明军中的客家人也聚集到广西,包括原先在闽、粤之溃军,郑成功之散卒,以及桂王之扈从,这部分客家人大约有2万人,抗清失败后,不少人迁入桂西土司地方(包括白山司、古零司、兴隆司等地),当地土著称他们为“新民”,即客家人。^⑤但客家人大规模入桂却是在清中前期。有清一代,客家人移居广西包括清中前期和清后期两个阶段。清中前期,随着桂西地区改土归流的推行,为汉族移民的深入开辟了道路,为清王朝实现对传统土司地区的直接统治奠定了人口基础。清后期客家人移居广西边疆地区,则与粤西“土客械斗”后客家人迁至中越边境地区谋生以及中法战争后移民实边有关。

(一) 清代桂西边缘地区客家移民的拓殖与实边

随着清中前期桂西边陲泗城府、镇安府的改流以及思恩府“内地化”进程的加快,客家人开始不断移居该地区,与王朝的政治统治、军事镇戍相配合,成为推动桂西边缘地区经济开发的力量。在泗城府凌云县,清初黄姓客家人从广东、江西迁入,清中叶王姓、罗姓客家人从江西迁入,杨姓、李姓、覃姓等从广东迁入;在西林县,清初有余、彭、张、文、郑、刘、林等姓客家人从广东迁入,周、林等姓从福建迁入,道光、咸丰年间有韦、吴、黄、阮、刘等姓客家人从广东嘉应州迁居西林,他们主要分布在高龙、西平、普合、那劳等地;在西隆州,清初改土归流后,黄、王、陆等姓客家人从广东、福建等省迁入。^⑥镇安府在清中期迁入了不少来自广东、福建以及桂东南郁林州、桂中宾州的客家移民,归顺州的客家移民大多数来自广东嘉应州、钦

① 钟文典. 广西客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7.

② 崇左县志编纂委员会. 崇左县志[Z].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352.

③ (明)王士性. 广志绎[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03.

④ 葛剑雄, 曹树基, 吴松弟. 简明中国移民史[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428.

⑤ 吴克宽修, 陆庆祥纂. 隆山县志第二编人口[Z]. 民国三十七年油印本.

⑥ 钟文典. 广西客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5.

州和广西博白、陆川、宾州等地,少数来自江西、福建和湖广;①镇边县(今那坡县)的客家移民也不少,乾隆年间,马、卢、梁、黄等姓客家人自广东、福建迁入镇边。②思恩府虽然保留了较多土司,但大多势力弱小,客家移民迁入的情况比较普遍。嘉庆、道光年间,有黄、杨、张、蓝、冯、方、曾、李、阮、鄢、陈等姓客家人从广东惠州、潮州迁居土田州境内,从事经商或农耕。③

在桂西南沿边地区,清中前期已经迁来不少客家移民,清后期由于中法战争后推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又吸引了一些客家人迁入。清中前期,陆续有客家人从广东嘉应州、廉州府及广西郁林直隶州迁入宁明州、思陵土州境内,而上思州境内也从广东嘉应州迁来了一些客家人。而在壮族聚居的万承土州,清初只迁来了冯、区两姓,到乾隆年间,则迁来了何、伦、黎、郑、关、陈、汤、唐等姓。④

清后期,随着越南从中国的藩属国变成法国的殖民地,岭南西部边疆面临着严峻的边防危机。清政府除了在沿边一带驻扎重兵、严密设防以外,还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措施,客家人也成为这次开拓岭南边疆力量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太平府与越南毗邻的边界线很长,是清末客家移民迁入的主要方向。清代陆续迁居太平府境内的客家人比较多,主要集中在附郭崇善县、龙州厅、凭祥土州、宁明州、思陵土州等沿边地区。清代龙州厅境内的客家移民数量也不少,其中王、江、吴、钟、陈、梁、甘等姓客家人来自广东,甚至上龙、金龙两土司境内也迁入不少来自广东、江西、福建的客家移民。凭祥土州的客家移民主要来自清后期,包括三部分:一是咸丰、同治年间从粤西廉州府和桂东南郁林直隶州境内迁移而来,人数较多,以务农为业;二是中法战争中随军入籍及战后移民实边中,又有一批客家人迁居凭祥;三是宣统二年凭祥改土归流,又掀起了一波广东客家人移居的高潮,有萧、杨、梁、彭等姓。⑤明江厅在道光末年动乱后,人多流亡、田多汗莱,于是田主从广东东部招徕大量客家人佃种田地。⑥思陵土州、土思州毗邻中

越边境,客家移民也多,主要在咸丰、同治年间从廉州府、郁林州等地迁来,“经营工商、农业,居留不返”。⑦“聚族而居,自成村落,务农为主”是太平府境内客家人的特点,他们虽然杂居于壮族地区,人数远少于壮族,但因为“聚族而居,自成村落”的特点,仍然保持着客家的语言和习俗。南宁府属上思州是清末客家移民的另一个方向,同治、光绪年间,一些客家人从钦州、防城、灵山等地移居上思,但该地的客家人远少于太平府境内的客家人。⑧

(二)清代钦廉地区客家移民的集聚与“内地化”进程

钦廉地区是客家移民迁入较早的岭南边疆地区,早在宋代,该地区就已经迁入了不少客家移民,只是这时他们还主要居住在城郭地区,广大乡村地区还是壮民等土著的势力范围。此后历经宋元之交和明清之际的移民过程,钦廉地区的客家人不仅深入乡村定居,成为当地主要居民之一,而且还向邻近地区输出客家移民。甚至在毗邻越南的偏远土司地区,客家人也不避艰辛,移居开拓。据陈维周《防城陈族之源流》载,清初博白客家人陈炳传携家带口迁居钦州防城,定居在河洲上峒大同村。另据防城《钟氏宗支簿》载,清中叶广东惠州永安县钟姓客家人移居防城。雍正以后,来自福建、广东、江西各省的客家人大量移居到钦州境内,至道光、咸丰之际,钦州西部土司地区经过客家人的垦殖,已经呈现出田亩日辟、农业改观的景象。⑨清后期,钦廉地区与桂东南的郁林直隶州成为今广西境内最为集中的客家聚居地。钟文典先生对现代广西客家集中分布地的研究表明,博白、陆川与合浦、浦北、廉江的客家居住地连成一片,共同构成了跨省区的广大客家分布区。今天钦廉地区的客家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2.7%,仅次于原郁林直隶州(今玉林市)的32.8%。⑩

清末中法战争后边疆危局给钦廉地区造成了

① 封赫鲁修,黄福海纂。靖西县志第二编人口[Z].民国三十七年油印本。

②④⑤ 蒙起鹏等纂修。广西通志稿社会编·民族二[Z].民国三十八年油印本。

③ 清宣宗实录卷378[M].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⑥ (清)佚名编。明江厅乡土志风俗纪[Z].宣统间抄本。

⑦ 李文雄等修,曾竹繁纂。思陵县志卷4社会篇·移民[Z].民国三十七年石印本。

⑧ 钟文典。广西客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6。

⑨ 黄知元等纂修。防城县志第一章缘起[Z].民国三十四年稿本。

⑩ 钟文典。广西客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6-82。

很大冲击,促使清政府调整行政区划,加强对沿边地区的行政管理,包括将沿边地区的土司进行改流,设置流官直接管辖的政区,比如防城县就由原来的防城司和如昔司改流而设。随着钦廉地区沿边地带政治的“内地化”,吸引了客家移民大批前往。据防城《凌氏族谱流水簿》载,光绪年间广东惠州府博罗县凌越堂的次子凌宗佑迁居防城罗浮岗松柏村。此外,清末粤西的“土客械斗”也迫使一部分客家人迁至钦廉地区甚至岛屿之上。比如涠洲岛作为北部湾中的一个海岛,曾经是渔民停泊靠岸和海盗出没之地,明代只有少量居民,清代实行封禁政策,加上自然条件恶劣,岛上的居民人数很少。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械斗”的爆发,直接导致客家人大量移居涠洲岛。咸丰末年,广东嘉应州发生大规模的宗派械斗,戴、李、邓、江、黄等客家小姓被迫外迁,最后辗转至涠洲岛落户。同治五年(1866),广东巡抚蒋益澧又将在粤西土客械斗中失败的数千客家人遣散到涠洲岛安置,于是涠洲岛成为客家人聚居的地方。^① 根据有关统计,清末迁居涠洲岛的客家人有6000余人,成为该岛的主要居民。上述客家人向钦廉地区的持续移居,无疑促进了岭南西部沿海边疆的开发和“内地化”进程。

四、宋代以来客家移民开发岭南西部边疆的历史意义

宋代以来,客家移民不断迁入岭南西部,成为开发岭南西部边疆的重要力量。在迁移过程中,西江—郁江—左右江、西江—黔江—柳江、西江—贺江、西江—桂江、西江—北流江—南流江成为重要的通道,客家移民沿着上述水路通道,迁往桂东、桂中、桂西、桂西南和北部湾沿岸地区,其中桂东南和北部湾沿岸地区逐渐成为岭南西部客家人的聚居地。清代以来,随着桂东南等地人口压力增大,客家人进一步向桂西边缘地区和中越边境地带迁移,成为开发桂西边缘地区和中越边境地

带的力量。

如果说宋代客家人移居岭南西部主要是为了躲避战乱的话,那么明清以来大批客家移民则主要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从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迁居岭南西部,他们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采矿业等各种行业,促进了岭南西部边疆的开发。特别是大量客家移民从事农业生产,推动了精耕细作农业在岭南西部的发展。客家先民作为后来者,在迁徙过程中,往往只能选择人口稀少、自然条件较差的山区定居,这是造成“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的重要原因。为了垦辟山地,客家先民发展出了适应山区农业耕作的人工水利设施——山塘,山塘在客家先民精耕细作、开发山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成为生产生活的中心,每个客家村落往往必定有一个山塘,山塘的大小则代表着一个村场或姓氏的大小、兴衰。

清代以来,迁入岭南西部的客家人根据多山的自然条件,居山、垦山、种山、吃山,多为单家独户的经营。艰苦的条件造就了客家人勤劳的精神,在北部湾沿岸之防城县,客家人开垦“土人之隙地,由是县境之田亩日辟,农业顿为之改观”。^② 客家移民见缝插针式的耕作,促进了荒地的开辟,同时对土著居民的耕种技术也是一种示范。正是通过自身的辛勤劳作,客家移民在广西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为广西土地特别是山岭地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总之,客家移民作为宋代以来迁入岭南西部汉族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甚至成为最主要移民来源,他们在岭南西部空间分布上的扩散,实际上就是不断从桂东南向北部湾沿岸地区、桂西南沿边地区和桂西边缘地区深入的过程,在王朝经略岭南西部、开发和巩固岭南边疆、实现岭南西部边疆地区“内地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① (清)王先谦. 同治朝东华续录第2册[M]. 台北:文海出版社,2006. 846.

^② 黄知元等纂修. 防城县志第四章輿地志[Z]. 民国三十四年稿本.